

但是，「八旗漢軍」不是「漢」，在 1644 年順治皇帝入關後，朝廷並沒有將八旗漢軍等同新投降的漢人，所以新投降的漢兵，只被編入「綠營」。不過，以後的發展，對「漢軍八旗」的身份發展非常不利。1688 年，佟國綱向康熙皇帝請求將撫順佟氏由漢軍正藍旗，改隸滿州旗下。他所持的理由是撫順佟氏祖籍是佟佳(今吉林省)，是滿人早期的聚居地。柯嬌燕認為佟國綱將撫順佟氏塑源於佟佳是杜撰的，目的是擺脫漢軍八旗的身份，這在以漢軍八旗為主的三藩之亂剛剛結束之時，尤其迫切。不過，雖然是杜撰，佟氏的申請最終得到康熙皇帝的應允，從此成為滿州人。之後，陸續有許多遼東宗族以祖譜舉證，轉入滿州旗下。1740 年，乾隆皇帝更公開表明，所有八旗漢軍本質上均是漢人，將仍留在漢軍八旗的人「出旗為民」，漢軍八旗的身份由是取消。至此，滿和非滿的分別，已由文化轉由血統決定。

從上述的綜合可以發現，本書無論對清帝國的形，以及帝國下不同身份的建構，均有獨創性的見解。值得強調的是，柯嬌燕的努力，不僅在於她運用了許多滿文資料，更重要的是，她對資料的運用是很小心的。例如，她對於古老資料，並沒有視之為理所當然的史實，在使用資料的同時，她特別注意到時代思潮與資料加插的關係。正因這種嚴謹的態度，使本書不落於俗套。

張瑞威
香港城市大學

方李莉，《傳統與變遷：景德鎮新舊民窯業田野考察》，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年，18, 8, 438 頁。

景德鎮城市經濟史專家梁淼泰指出，景德鎮是世界上歷史最久的一座單一手工業城市，其製瓷技術馳名中外。即使歷經現代化工業經濟的衝擊，景德鎮仍然維持著歷史最久的單一手工業城市的本色，20 世紀 80、90 年代景德鎮興起的民窯業讓人又一次看到了「傳統」的復興和巨大魅力。方李莉所著《傳統與變遷：景德鎮新舊民窯業田野考察》(以下簡稱《傳統與變遷》)一書嘗試通過解讀景德鎮民窯業的歷史和現實來反思景德鎮民窯業的傳統及其在現代化中的重構。

方李莉是景德鎮人士，曾經在景德鎮陶瓷學院獲得碩士學位，後到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攻讀博士學位，畢業後曾在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進行博士後研究，《傳統與變遷》一書就是其在博士後出站報告基礎上改寫而成。此書共包括三篇文章和結語：第一篇題為〈傳統在現代化中的重構〉，主要是考察

景德鎮改革開放後新興的民窯業的發展歷程表現出來的民窯業的傳統及其在現代化中的重構；第二篇題為〈來自傳統的思考〉，主要對從清末到民初景德鎮民窯業的系列考察和思考，包括早期現代化在景德鎮陶瓷業中的推行和所遇到的阻力；第三篇題為〈景德鎮民窯業五百年興衰史〉，講述的是景德鎮陶瓷業明清時代的發展、繁榮及衰落歷史；最後為結語，是作者在前面論述基礎上補充和總結。在結語中，作者重申，景德鎮民窯業中的工藝技術、文化表象都在現代世界一體化進程中有所改變，但仍然必須「在傳統中理解現實和展望未來」。

對景德鎮民窯業中傳統因素在現代的復活和再創造，是此書的主題。20世紀90年代中期，就在一些大瓷廠迅速向現代化生產邁進的同時，景德鎮的傳統手工藝不僅沒有消失，而是以農村包圍城市的勢頭在蓬勃發展著。對於這種勢頭，作者解釋道：「隨著新技術的開發和引進，以及整個社會的迅速前進，景德鎮在地理環境和自然資源方面的優勢越來越成為過去。但儘管如此，它的另一個優勢，也就是一千多年來祖祖輩輩留傳下來的陶瓷文化歷史，精湛的手工藝以及千百年來在這裏所形成的各種人文環境，在現代的社會中越來越明顯地凸顯了出來。這是一種新的優勢的互相轉化。」（頁195）作者並且認為，景德鎮的手工藝陶瓷永遠都不會消失，「它將是景德鎮上千年來的傳統文化和傳統技藝的儲存庫，它的文化意義也許大於它的經濟意義。」（頁195）換言之，景德鎮民窯業得以重新興起的根本原因在於其深厚的民窯業的傳統。

新興的民窯業的蓬勃發展直接淵源於傳統的民窯業，但是又不是簡單地模仿和再現，是一種「活」的文化傳統的「再創造」。基於此，作者並不是簡單地歸納出「傳統」，而是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去考察陶瓷工藝的發展變化，並使之和民窯業的生產和從業者生活聯繫起來，從而達到了一種真正的文化體驗。作者在文化人類學理論指導下進行的田野考察應該說是相當成功的。筆者認為此書最精彩的部分就是第一篇中對新興民窯業的考察，通過作者艱苦的田野考察，我們看到了隨著改革開放進行和與世界市場的聯繫的加強，民間手工藝的巨大活力，更重要的是我們看到了下崗工人、民間藝人、進城的外鄉農民是如何被市場經濟編織起來，組成作坊老闆、個體工商戶、流動商販、外地客商等角色，促進了景德鎮民窯市場的繁榮。

熟悉陶瓷生產和工藝的作者並不滿足於簡單地類比和尋找「傳統」，而是敏銳地抓住了傳統的民窯業在現代的一些根本變革。最大的變革來自於技術，主要是窯和坯房的技術變革帶來的系列影響，特別是由瓦斯窯代替傳統的窯爐，不僅是技術變革，而且引起一些行業的消失和傳統的行業崇拜活動消失，

這實質上已影響到了文化活動和人們的心理素質。傳統的瓷業程式中最關鍵的是燒窯，過去景德鎮的手工制瓷程式複雜，被稱為三十六行，須「過手七十二下」，但無論所有的工序完成得多好，只要窯火不好便前功盡棄，所以陶工燒窯時心理非常緊張，每年從初冬開始，各窯還要舉行暖窯神的活動。1992年起景德鎮開始出現瓦斯窯，瓦斯窯不需用柴，有溫度計，整個過程由電腦控制。這樣一來，不僅節省了許多道工序，原來與燒窯業配套的窯磚業、鑿窯業等許多行業也隨之消失，而且使原來把樁師傅的看家本領成了無用之物。作者認為，瓦斯窯的出現是景德鎮制瓷業從一個時代向另一個時代的轉捩點。

20世紀90年代新興的以樊家井為代表的仿古陶瓷集散地也不是明清時期的景德鎮，在作者對樊家井的社區文化特點進行考察後，發現新興的民窯業絕非傳統陶瓷業的簡單翻版，而是具有自身特點。生產技術和文化觀念的改變也推動著景德鎮陶瓷藝術在風格上的變化，那種可以祖祖輩輩都不改變，而一直流傳下去的藝術風格及內容已不可能存在了。

與這些改變相應的是整個社會結構的變化，此書中關於傳統民窯業的社會分層的調查是十分引人入勝的，為我們留下來大量的社會經濟史的材料。作者的調查範圍十分廣泛，涉及景德鎮社會經濟生活中的行幫組織、窯業生產中的各個行業行規和生產流程、有關生產和生活的俗語、工人工資等各方面細節。筆者相信，在作者的另一本田野考察筆記式著作《景德鎮民窯》中會有更多具體而生動的內容。

至此，作者已經完成了對景德鎮民窯業傳統在現代中變遷與重構的考察和思考，讀者則意猶未盡。由於作者在第一篇中更多的是敘述了20世紀90年代民窯業的發展和對傳統的變革，人們必然追問，既然景德鎮新興民窯業根源於傳統的民窯業，兩者之間到底有多少實質而具體的關聯？或正是要回答這個問題，作者在後面的兩部分中重點考察了傳統的民窯業。然而，多少讓讀者失望的是，作者在後面傳統民窯業的論述中並非很緊密地和第一篇中的相關論述結合起來討論，作者在〈引言〉中自稱本書「三個部分的結構是鬆散式的和開放式的」。而且，讓筆者感到十分意外的是，作為一本考察景德鎮傳統民窯業的著作，竟然對治景德鎮城市經濟史多年的學者梁淼泰的成果《明清景德鎮城市經濟研究》一書隻字不提，這不能不說是個重大失誤。在第三篇〈景德鎮民窯業五百年興衰史〉中的有關論述和梁淼泰的成果還有相當的重覆。第二篇〈來自傳統的思考〉重點考察的是民國時期景德鎮在實業家和政府努力進行的現代化建設過程，作者的許多論述是以《景德鎮文史資料》收入的回憶錄為基礎，而沒有去查閱實業家杜重遠在景德鎮時所創辦的《民眾月刊》，這一缺失無疑

會使作者的相關論述失去進一步細緻化和深化的機會。

因此，或正由於此書三部分結構的鬆散而開放，在結論中，作者關於景德鎮民窯業傳統的「復興」和重構沒有很好地和景德鎮厚重的傳統民窯業結合起來，因而，顯得有點空泛而馳騁議論。筆者期盼，《傳統與變遷》一書在未來的修訂版或作者另一本新著中可以看到紮根於「傳統的民窯業」的「民窯業的傳統」在現實中的變遷與重構的生動景象。

黃志繁
南昌大學

***Mao's War against Nature: 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 By JUDITH SHAPIRO.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xvii, 287 pp.**

作為劍橋大學出版社「環境與歷史研究」系列的其中之一，朱迪思·夏皮羅(Judith Shapiro 2001)年的新書《與自然之戰——革命時代中國的政治與環境》(*Mao's War Against Nature: 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分析了1949年後毛澤東「人定勝天」的思想如何統治並影響了當時社會中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係以及這種思想帶來的後果。從政治運動的角度來分析毛澤東時代對自然環境的破壞，為中國環境歷史研究領域開拓了新的視野。

近二十年來，環境主義的問題越來越受到歷史與人類學家的關注，而對於中國的環境問題的關注，似乎偏重於改革開放之後經濟改革帶來的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上。但是，要理解當代中國的環境污染與破壞，單從經濟改革的角度是遠遠不夠的，夏皮羅認為，必須回溯到對今日中國影響至深的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運動與環境理念。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運動和群眾運動，不僅對人和社會造成極大的影響，同時也是對大自然的嚴重肆虐。作者指出，從1949至1976年，毛澤東放棄了古代中國「天人合一」的理念而實踐他著名的「人定勝天」的口號，把自然當成人類最大的敵人和征服對象。由此而來的「大煉鋼鐵運動」，「把荒山變良田運動」，「填湖造田運動」，以及「全民學大寨運動」，由於不理會科學家的勸告和忽視地區差別，使中國的自然環境遭到了嚴重的摧殘。

夏皮羅在概述中講到，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鎮壓、對烏托邦理想的急切追求、教條的形式主義及由國家強制的遷徙移民，大大影響和扭曲了人與自然的關係。接下來她分別就這四個部分進行了討論。第一是政治鎮壓，這裏包括了知識份子、科學家、官員以及普通人因為對毛澤東關於人與自然關係的理解持